



陈楸帆

文/羊城晚报记者 何晶
图/受访者提供

中国科幻“顶流”陈楸帆推出新作《英歌沸腾》：“移民星际，潮汕人会第一批先锋部队”

陈楸帆，广东汕头人，北京大学毕业，曾在谷歌、百度等科技公司工作。他是最早使用AI参与创作的作家之一，中国科幻界“顶流”，被称作“中国的威廉·吉布森”。他是2014年花地文学榜得主，茅盾新人奖、星云奖、银河奖拿到手软，作品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全球圈粉。今年初，由他担任总编剧的国内首部AIGC短剧《神·笔》登录芒果TV，春节假期播放量过亿。

陈楸帆一面走在科技最前沿，另一面则是非常老派的写作者，他写给青少年的科幻系列作品《英歌沸腾》最近由上海译文出版社重磅推出。

近日，陈楸帆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

具有潮汕人的两重性

羊城晚报：《英歌沸腾》系列创作于什么时候？

陈楸帆：大概2024年下半年，当时英歌舞已经火出圈了，这是潮汕地区特别有动感的艺术，我认为非常适合用小小说的方式去呈现。对于潮汕人来说，英歌舞是非常日常的习俗，小时候我并不觉得这有多独特，直到离开家乡到大城市，才发现并不是所有地方的习俗都保留得这么好。

羊城晚报：怎么会想到把英歌舞放在科幻世界里？

陈楸帆：潮汕人其实是特别愿意往外拓展的族群，从一百多年前坐红头船、下南洋，到现在全球开枝散叶。潮汕族群在往外走的同时，把方言、美食、习俗这些传统文化保留得特别好。那我想，也许某一天能移民星际，潮汕

人会是第一批先锋部队，把潮汕文化带到星际，开启冒险。如果到了新的行星，英歌舞会绽放怎样的新活力？对年轻人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年轻人如何面对传统和过去，如何与家人、与未来共处？这是我想在这个系列中探讨的话题。

羊城晚报：相比原来写赛博朋克，这次创作有哪些不同的感受？

陈楸帆：写科幻很多时候我们是在写未来，你要拉开和自己的距离，至少心理距离是更远的。但是写《英歌沸腾》，我发现很多东西无法摆脱，血脉和根始终在那里。潮汕人一方面特别喜欢冒险，另一方面又特别保守，我身上也有这种两重性。明白了这一层之后，思考的就会

是以怎样的方式让更多人看到其中价值的东西。

不是出于自身需求去做事情会“非常可怕”

羊城晚报：《英歌沸腾》这个系列的受众是多大的孩子？

陈楸帆：最初的定位是小学高年级到初中低年级的孩子，相对来说他们有更充裕的时间阅读课外读物；也可以变成亲子共读的书，并不局限于某个年龄层。昨天一位朋友和我说，他女儿上小学一年级，特别喜欢这本书，翻得都卷边了，我就特别想知道，到底哪个部分让她这么着迷。

我接触了很多小孩，他们有特别强的探索欲和好奇心，应当通过阅读激励他们去探索和发现。我现在的某种使命感是，要为青少年写作。这个过程需要学习他们是如何看待世界的，如何用他们的情感和行为模式去写，而不是让他们觉得这是大人在“假装”。

羊城晚报：现在的孩子都是AI时代原住民，您怎么看待AI给他们带来的影响？

陈楸帆：青少年在养成深度阅读、独立思考和创作能力的关键时期，如果过度依赖AI完成学习和创作任务，大脑中负责这些功能的区域会缺乏必要的训练，相关的能力就无法得到充分发展。这会直接导致他们逐渐丧失自主学习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整个思维模式、表达能力等等，很难真正建立起来，而这本应该是教育的核心目标。

少数金字塔尖的精英，会有效利用AI以几何倍数去放大智力、信息、资源上的优势，同时保持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创造力和批判性思维，从而拉开越来越大的差距。这种认知上的差距带来的“马太效应”，可能会越来越严重。

羊城晚报：您也在高校里教书，对

现在的年轻人有什么样的感受？

陈楸帆：不管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感觉他们都有点沉重。去年我和梁鸿老师做《要有光》的新书活动，现场来了很多人，我们的一个共识是，现在年轻人最欠缺的是生命力，这不是靠某个课程去培养出来的。

你想象一下，如果一个人不是出于自身的需求去做事情，一直处在被动的状态，被外界的价值或是衡量体系推着走，到了某个临界点，他就会开始质疑自己，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会失去动力，会怀疑自己存在的意义，这是非常可怕的。

生命教育应该是所有基础教育的底座。现在我们都讨论教什么、怎么教，但“为什么学”其实才是需要去解决的问题。那我希望用我的创作，让孩子们能代入到个体成长经验中，让他们理解作为个体的“我”是非常珍贵的，应该用自己的生命去做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这也是我写作这套书的出发点之一。

“大家都觉得AI写得足够好，但其实并没有那么好”

羊城晚报：您怎么看AI和写作的关系？

陈楸帆：我应该是国内作家最早接触AI的，大学毕业后在谷歌这类科技公司工作过很多年。大概十多年前我就开始用AI工具做辅助，现在大家都在用的大模型，其实是近两年才出来的，而我是比较完整地见证了整个发展过程。

现在这个阶段，我们反而更需要阅读、写作，回到old school(老派)的方式。很多东西太过虚拟之后，会影响你对信息的理解和吸收。比如有声书，其实并不是所有书都适合听，尤其是需要

深度思考的书，你听完之后可能什么都没吸收，完全没进入大脑，非常光滑地就溜过去了，然后又要重新看一遍。

我经常出差，一定会带上一本纸质书。这可能是我们在这个时代，在使用科技的同时，又要保持自己主观能动性、判断力和文学品位的一种方式。无论是独立思考能力还是审美能力，都需要你通过漫长的阅读去积累。如果没有这种肌肉训练，你不可能一下就写出多好的作品，甚至看不出AI写的和你写的有多大的区别。

羊城晚报：您应该是AI重度用户，一般是怎么用它来帮助自己的？

陈楸帆：对，我用AI很多，但和大家想象的直接用不是一回事。我会让AI变成很多不同的agent进行角色扮演，比如思想者、哲学家、科学家等等。我在《英歌沸腾》里写到“潮星”这个生态系统，我会提问，想象这个系统是怎样，怎样用到一些元素会更可信，总之是进行很多轮的讨论。最后的结果我不一定会用，但这个讨论过程会给我很多灵感和启发。

“我们不再是科幻作家，我们就是现实主义作家”

羊城晚报：今年初您担任总编剧的AI短剧《神·笔》在芒果TV播出，播放量破亿，现在还在继续做相关产品吗？

陈楸帆：对，《神·笔》大部分是2025年完成的，里面角色的一致性、稳定性其实还是不太可控。但到了今年，技术发展已经完全是NEXT LEVEL，变化太快了。现在更多的限制是产能的限制，算力在排队。我们接下来还有一系列作品，不仅有短剧，也有70分钟以上的长剧。

羊城晚报：很难想象AI长剧会是什么样，这部分受众是什么人？

陈楸帆：现在受众的心态是非常割裂的。一部分人会本能抗拒，就不想看AI做的东西，认为是对他个人的侮辱。但中国人口基数这么大，总会有人想看AI到底能做成什么样。最近我刚看了一个哈萨克斯坦的公司借助中国的大模型做的一部短片，做得非常好，在流媒体平台一下就被爆了。

这就好比十年前，在作协 and 微软小冰团队的一场活动上，现场提问在场作家，你们谁相信AI写得和人类一样好？没有人相信，只有科幻作家坚定站在AI这边。现在过了十年，没有人再讨论这种问题。

我们还处在一个历史过渡期，会质疑很多东西，会抗拒、否认，实际上每一次工业革命、科技革命都一样。过渡期之后，你会发现浪潮无法阻挡。现在已经无法想象回到互联网之前的时代，历史一浪接一浪往前推，那我们必须找到共存的方式，去适应新的媒介形态，新的讲故事的方式。

羊城晚报：一方面走在科技最前沿，另一方面还在做很“古老”的写作，您会觉得割裂吗？

陈楸帆：非茨杰拉德说过，衡量一个人智力的标准，就是看他能不能在脑子里同时容纳两种完全对立的思想，并且不阻碍他正常行事。我可能就是这样的人，脑子里有很多看起来非常矛盾的东西，但不妨碍我做事情。我不纠结，也不内耗，书写完就忘了，继续写下一本。

我经常和朋友讨论，接下来五年、十年会变成什么样子，一个共识是现在能预见的时间窗口越来越短，因为变化太快了。很难说我们写的到底是未来还是现在，有可能等我写出来，在几个月已经变成了现实。我们不再是科幻作家，我们就是现实主义作家。



近百多年间，从近代到当代，广州成为中国社会变化发展的风向标。与之同步，文学作品特别是长篇小说中的广州形象，仿佛时间长廊中的一张张照片，由时代打光、城市布景、作家个人经历学识修图而成，折射出光明的沧海桑田、人间的千变万化和城市魅力的持久永恒。

近代：百年未见之“怪现状”

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的70余年间，广州成为全国乃至全球关注的焦点，很多百年未见之“怪现状”发生在广州，因此，大量章回体小说以广州为故事背景或者描写广州发生的事件。

笑翁的《羊石园演义》排印于1899年，虚构人物“苏氏”一家在广州城破前后的遭遇，叙述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入侵、两广总督叶名琛失城、广州军民反抗的全过程。同一年由香港书局排印的“不题撰人”的《林文忠公西战记》同为章回体小说，从题目就可以看出讲述林则徐虎门销烟和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故事。类似以真人真事为蓝本虚构成章回体小说的，还有1905年在香港出版的黄小配的《洪秀全演义》，小说的第一回讲到洪

秀全在广州受洗。

除了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这样的宏大政治事件，中国发生的细微社会变化也在广州上演，最为典型的便是“卖猪崽”。吴趼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在《新小说》连载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1904年《绣像小说》连载旅生的《痴人说梦记》、1905年上海刊印无名氏的《苦社会》、1907年署名碧荷馆主人的《黄金世界》、1909年小说改良社印刷治逸的《新七侠五义》等等都写了广州和香港“卖猪崽”的现象。

不可否认，近代广州内忧外患，小说中的广州也千疮百孔，成为作家批判现实的靶子。但自古以来，广州也有繁华热闹多姿多彩的一面，不少小说写到广州的节庆、民俗文化，比如，刊刻于嘉庆九年(1804)但常被学者归入近代小说中讨论的庚岭游人的《蜃楼志》，就描写了广州人过端午、中秋、重阳、春节等节日的习俗。

1927：“红中夹白”的小高潮

对于广州来说，现代文学是沉寂的冬天。一方面，广州缺乏属于自己的、强大的创作队伍；另一方面，广州并非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外省作家对于表现广州的热情并不高。但凡事总有例外，1927年前后，鲁迅、郭沫若、茅盾、成仿吾、郁达夫、郑伯奇、王独清等一批左翼作家和创造社成员集中南下广州，推动广州的文学表达形成了一个高潮。

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掀起高潮。郭沫若从上海

到达广州，任中山大学文科学长，组织“创造社广州分部”，发表《革命与文学》，北伐开始后随军北上。1927年，鲁迅从厦门移居广州，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后蛰居白云楼撰写《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完成《朝花夕拾》部分篇目。对于广州，鲁迅的评价是：“像红布标语中写的白字那样，‘红中夹白’”。1926年，郁达夫应郭沫若邀请南下广州，1927年回到上海后发表《广州事情》，引发郭沫若、成仿吾等创造社同伴批评。郁达夫还有一些文字描绘政治以外的广州，其笔下的广州延续了清末沈复《浮生六记》的余味，浓缩了旧社会广州的风流享乐，泛舟荔枝湾，远望白云山，然后去陈塘逍遥，他眼中的广州与大革命的风暴无关，只是醉卧美人的温床、逃避现实的梦乡。

抗战胜利后，黄谷柳在香港《华南报》连载长篇小说《虾球传》，讲述珠三角城市市民生活，被茅盾称赞为“华南最受读者欢迎的小说”。

十七年文学：迎来一个高峰

新中国成立后到“文革”前，当代文学创作迎来了一个高峰，革命题材、农村题材成为热点。广东作家此时兵强马壮，广东作协拥有陈残云、欧阳山、吴有恒、杜埃等一批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作家，吴有恒1962年创作了《山乡风云录》，陈残云1963年创作了《香飘四季》，都是反映岭南农村新面貌的佳作。广州以独树一帜的文学形象给广大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这座南方城市代表着温暖、美丽、丰富、积极、乐

观和可亲可爱。

相对而言，城市题材、市民生活变得门庭冷落。因此，同一时期欧阳山的《三家巷》就显得尤为难能可贵，当年这部小说因为描写革命者的爱情与生活而受到广泛的批判，今天看来，恰是《三家巷》树立了广州地方特色小说的标杆：一是时代洪流与个人命运的碰撞，《三家巷》中有真实的历史人物张太雷，出现了真实的历史事件沙基惨案、广州起义等；二是以浓郁的地方特色作为人物活动背景，如乞巧节，“依照广州的风俗，乞巧这天晚上姑娘们摆出巧物来，就得任人观赏，任人品评”；三是作品的全国影响力和长期影响力。这个时期广州为广大读者所熟知的还有秦牧的散文名篇《花城》。

1961年前后，国内很多著名作家都来到广州，写下不少热情歌唱广州美好的散文名篇，例如老舍的《春来忆广州》、冰心的《记广州花市》和杨朔的《荔枝蜜》，不过，这些文章的影响力都无法与秦牧的《花城》相提并论。

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南风窗”

“文革”过后，伤痕文学、改革文学依次出现，岭南小说创作进入新阶段，这一阶段以改革开放为主题，城市重新回到了文学的聚光灯下。代表作品有林经嘉的《急流》、钱石昌的《商界》、陈国凯的《大风起兮》、吕雷的《大江沉沦》等，在改革文学中，广州成为新旧观念交锋的战场，是改革力量稳固的大后方。《大风起兮》创作于1994年，生动描绘早期开发区的躁动氛围，如“三来一补”企业、走私暗流等。《大江

沉重》出版于2008年，因此，更为全景化地描绘了城市变化，小说以广州等城市为原型虚构了“南都市”，核心情节是“杀出一条血路”的体制改革。随着城市地位的提升，广州历史和广州文化日渐成为本土作家重点关注的题材，大家开始用小小说探索城市文化的起源。杨万翔2004年出版《镇海楼传奇》，通过镇海楼的建造、毁灭、重生，串联明清易代之际广州城的命运，探讨岭南文化的韧性。对于故乡广州，本土作家感到“更有责任让她成为一个深沉稳重、高贵优雅的城市”（伊妮），伊妮在1994年出版了以高第街许氏家族为原型的《千秋家国梦》。

新时代：“广州写作”有再起之势

进入新时代，文化自信的提升为广州的文学表达开启了一个真正多元化的创作格局。从创作主体来看，大量来自五湖四海的人才涌入广州，广州的作家群体也随之壮大，一类是广州本土作家，一类是新客作家，两类作家都热情讴歌广州，从不同视角描写广州的变化。以张欣《如风似壁》、王十月《不舍昼夜》等为代表，关于广州的文学写作有再起之势。

回顾百余年文学历程，随着城市地位的变化，经过数代人的潜心经营，广州的文学形象从支离模糊、边缘负面变得中心正面、清晰明亮。变化，是广州文学形象不变的主题，目前广州已经日渐进入一个文学创作的繁荣阶段，可以预见，未来表现广州的文学作品一定会像迎春花市一样，香飘四季。



AI制图